

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 從晚清到民國

文・圖／蔡祝青

當代歷史學者張灝先生曾指出1895-1925年約三十年間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此時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是思想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筆者基於個人的興趣與陶養，對於這段時期的關注主要落實為「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從晚清到民國」，目前已涉獵：（一）近代英華/華英辭典中的「文學」觀念、（二）晚清報刊中的「文學」觀念、（三）翻譯小說的譯介與轉化、（四）文學體制的創立，以及（五）「國民文學」史觀的建構等五大議題，分從雙語辭典、近現代報刊、翻譯小說、學科體制、文學史等面向探索現代「文學」觀念、外來的文類觀、文學史觀如何形成？以及文學科如何在現代大學中建置。以下略作梗概說明：

英華/華英辭典與報刊中的「文學」觀念

在「文學」觀念的探討裡，筆者除了受到英國學者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關鍵詞」（Keywords）研究的啟發，也在學界探討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之後，反思晚清百科全書的流傳終不及人手一編的雙語辭典，於是透過梳理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的編纂與流通來描繪學科新名詞朝向標準化、規範化的大致走向。研究中除了標舉顏惠慶於1908年主編的《英華大辭典》即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英華辭典，（圖1）同時探索「文學」何時成為literature的對譯詞，以及從傳統到現代意義的轉變。

在工具書的定義之外，筆者同時關注學科新名詞的實際運用，尤其報刊作為近代新興的傳播媒介，即是體現重大觀念遞嬗的場域。於是筆者試以「文學」



圖1：顏惠慶主編《英華大辭典》。
圖片來源：中研院近史所《英華字典資料庫》，網址：
<http://mhdh.mh.sinica.edu.tw/dictionary/help1.php?book=18>

作為關鍵詞，以近代報刊的論域作為考察對象，藉以檢視文學觀念的歷史發展。據資料顯示，1901年以前，「文學」相關論述主要由外國傳教士主導；至1902年以降，晚清知識份子則掌握了論域的發言權。關於「文學」觀念的探討，約可大分為三類：其一，借鑑明治與歐西學者的文學史觀察，反思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代表人物有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其二，透過自編文學教科書，開始定義「文學」，梳理中國文學之發展，代表人物有黃人、林傳甲等人；其三，基於「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之宗旨，而欲使「文學」觀念重返中國傳統經史者，代表人物有劉師培、章太炎等人。透過晚清知識份子的論辯與思考，雖然還未使現代「文學」觀念趨於穩定，但基本上已體現出從傳統到現代的遞嬗，以待來者續做發揮。

翻譯新文類：偵探小說的接受與轉化

在翻譯文學方面，筆者的博士論文《譯本外的文本：清末民初中國閱讀視域下的《巴黎茶花女遺事》》（2009）主要從晚清的文化語境探討林琴南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翻譯言情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如何在晚清中國被譯介、傳播、以及再生產的過程。有鑑於晚清時人最為熟悉的翻譯小說人物即是茶花女與福爾摩斯，近年筆者也著手蒐集偵探小說相關史料，目前已發表〈接受與轉化：試論偵探小說在清末民初（1896-1916）中國的譯介與創作〉（2016）作為初步研究成果。

關於福爾摩斯在中國，實際上已累積了不少前輩學者的精彩論辯，筆者主要從報刊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出發，綜合探討偵探小說文類在晚清民初中國如何被接受與轉化的歷程。文章主要展開雙重脈絡化的細讀：其一是報刊連載的脈絡，透過梳理自《時務報》到《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圖2）的二十年，晚清的譯者們如何解（誤）讀、翻譯西方的偵探小



圖2：（左）1896年《時務報》第六冊連載〈英包探勘盜密約案〉（The Naval Treaty），此為第一篇中譯福爾摩斯探案；（右）1916年中華書局出版《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共12冊。



圖3：《點石齋畫報》利集八期（1898年）「包探私刑」。轉引自「中國近代報刊庫」之「要刊篇」第1輯（100種晚清民國期刊）。



圖4：神田喜一郎先生（右二）與吳守禮先生（右一）在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前。轉引自陳奇祿等著，《從帝大到臺大》（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3），頁28。

說，我們可看到偵探文類、主角與作者由誤以為真實到回歸虛構的接受過程；其二則是回到現實的上海租界環境與「包探」的設置問題上，重新理解偵探小說得以在短時間大量譯介流傳的現實原因。在研究中最讓人感到驚喜的發現，主要是晚清譯者何以用「包探」，而不是「偵探」來對譯detective？當我在不疑處有疑，嘗試以「包探」作為關鍵詞檢索《申報》與晚清報刊全文數據庫，眼前竟展現出一片環繞著「包探」議題的上海租界現實，原來1854年英租界成立「工務局」，同時設置了保護租界治安的警力組織，稱「巡捕房」（即Shanghai Police Station），並設巡捕（police，即警察）、包探等警力，使成明查暗訪，互為表裡之勢。這裡的「包探」，俗稱包打聽，即密探之意，竟完全打破我長期以來對於「包探」望文生義式的理解，以為該詞來自公案小說中最會辦案的包青天！若再細讀報刊上關於「包探」的報導，則更見西包探與華包探不僅高下立判，華包探風氣之敗壞實已達到讓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圖3）正是這些現實原因，使得晚清譯者們發而為文，並風起雲湧大量追捧、譯介以福爾摩斯為首的偵探小說！甚至奉為警界教科書，可供司法界借鑑。經此探索，筆者深覺上海刑律環境的現實土壤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公案小說的文類土壤！

文學體制與文學史觀的建立

在文學體制方面，主要從北京大學百年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反思震旦學院（復旦大學前身）、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臺大中文系前身）的建構。相較於官辦的京師大學堂（1898），震旦學院的開辦（1903），主要以馬相伯個人的宗教信仰與身份認同，取法當時最有系統的天主教耶穌會的教育制度，使得震旦學院呈現出文學/科學分立、教會大學轉型成俗世大學、以及知識份子辦學以救國的意義。若將眼光放回臺北帝大東洋文學講座的設置（1929）（圖4），則清楚展現其帝國/殖民脈絡、日本帝國大學傳承、以及朝向科學化的漢學研究面向。

另在文學史觀的建構上，筆者則重新梳理日本明治漢學家的《支那文學史》，並進一步探索東洋文學講座與此之連結。眾所皆知，現代文學觀念的形成與傳統小說、戲曲受到重視有極密切的關係。而近代日本漢學家的文學史論述，即以〔法〕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種族、環境、時代」（‘race, surroundings, epoch’）學說作為立論基礎，於是慢慢形成了「國民文學」史觀，重視小說與戲曲，代表學者正是藤田豐八（首任文政學部長）、笹川種郎與鹽谷溫等漢學家。而鹽谷溫曾在1936年受邀至臺北帝大文政學部短期講學一個月，後寫下《臺灣遊記》，連載於《斯文》雜誌。（圖5）經研究顯示，鹽谷溫的臺北講學實是他晚年海內外講學的一個重要環節，透過與中國學者（如魯迅）的交流互動與海內外講學經驗，更促使他的文學史論述得到增衍發展而更形完備，鹽谷溫於1946-1947年修訂出版的《支那文學概論》，一經比對，正是臺北講授「中國戲曲小說史」課程的主要內涵，藉此，不僅讓我們得以瞭解鹽谷溫臺北講學的實況，也可將臺北講學放在鹽谷溫的海內外教學研究與出版的學術脈絡中而確立其意義。

綜上所述，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實是一門牽連甚廣的議題，有鑑於近代文學與思想史離我們未遠，百年後仍主導著我們對於諸多事物的思考，頗值得學界諸君投注心力探究。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本專題策畫／中文系洪淑苓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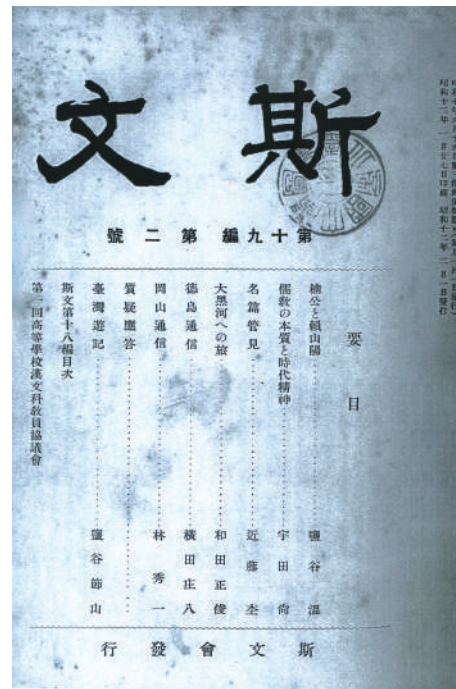


圖5：《斯文》雜誌第十九編第二號（1937年）開始連載鹽谷溫的《臺灣遊記》

參考文獻：

- [1] 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三期（2012年12月）：275-335。
- [2] 蔡祝青：〈創辦新教育：試論震旦學院創立的歷史意義〉，《清華中文學報》第十二期（2014年12月），頁373-424。
- [3] 蔡祝青：〈接受與轉化：試論偵探小說在清末民初（1896-1916）中國的譯介與創作〉，收於彭小妍主編：《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頁111-146。
- [4] 蔡祝青：〈帝國殖民與文學科的建立：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初探〉，收於洪淑苓、黃美娥主編：《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秀威資訊，2017），頁281-333。
- [5] 蔡祝青：〈帝國視野下的壯遊：鹽谷溫〈臺灣遊記〉中的風土人文與（反）殖民意識〉，《早稻田大学総合人文科学研究センター研究誌》（WASEDA RILAS JOURNAL）NO.6（2018年10月），頁469-477。
- [6] 蔡祝青：〈「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以晚清報刊的運用實例為中心〉，已通過審查，預計於《清華中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20年6月）刊登。



蔡祝青小檔案

學歷：天主教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

現任：臺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臺大語文中心中國語文組組長。

經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科會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曾任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等校兼任講師。

榮譽：2017 年榮獲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獎」（2016-2017）「評判提名」；2008 年榮獲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頒發「第二屆比較文學學會研究生論文獎」。

授課：大學國文、現代中文及習作、明清小說選讀、近現代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概說、報刊研究導論等。

研究領域：中國近代文學與文化，明清小說，翻譯研究，報刊研究，觀念史研究，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